

英雄的颂曲 豪杰的悲歌

——《三国演义》、《水浒传》比较研究之一——

陈年希

《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我国古代章回说部的两大“奇书”。这两部杰作，都有其历史原型，又都经历过民间艺术的长期加工，最后完成于文人作家之手。它们出现在同一时代，并为文坛双星而同耀后世。人们常把它们并提，却很少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研究。事实上，这两部小说之间，有着许多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诸如：两书的作者是否都是罗贯中？它们问世时间谁先谁后？主要倾向是否都是“为市井细民写心”或者“颂扬忠义”？如此等等。探索这些课题，运用比较的方法去综合研究这两部作品，应当说是一条可行的途径。现仅就管见所及，试从人物形象出发，将《三国》和《水浒》作一初步的比较，以探求它们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异同。

一、乱世英雄和绿林豪杰

文学是人学，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主旨。概观《三国》和《水浒》，我们不难看出，前者塑造的是图王霸业的乱世英雄，后者刻划的是替天行道的绿林豪侠。讴歌英雄豪杰，是这两部小说的共同基点。

问题是，在以往的研究中，探讨作品中英雄豪杰的阶级属性，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不同的意见，激烈的争论，往往由此而生。如果说，把《三国》英雄划归于地主阶级营垒的看法，人们对之还比较一致的话，那么，对梁山好汉的阶级归属问题，争论就激烈了。有人说是起义的农民英雄，有人说是地主阶级内部的忠义之士，也有人说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绿林豪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平心而论，各家之说，都有某些可取之处，然而，也正如他们在相互论争中所指出的那样，又各有其明显的片面性。其症结，我以为在于过去我们的研究眼光，过于集中在艺术形象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而对联系作品与生活的重要中介环节——创

作主体作家，特别是作家的审美心理重视不够，研究不深。文学固然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社会生活不能直接进入文学作品而成为艺术典型，必须经过创作主体作家主观的审美意识的能动作用，特别是审美理想的表达，才能塑造出真正的艺术典型。在我看来，《三国》、《水浒》中的那些英雄豪杰，从本质上来说，并无二样，他们都是数百年来创作、加工、整理这两部小说的无数个民间艺人、书会才人和罗贯中、施耐庵他们的审美理想的表达。他们的审美理想，与其说是表达了市民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是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感情，不如说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共同的民族审美心理。正如丹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序中所说的那样：“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去解释它，那么我们在这作品中所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也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种种族的心理”。换句话说，《三国》、《水浒》中的英雄豪杰，已不属于某一个阶级或阶层，而是那个时代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物，是体现了民族之魂的史诗式的英雄。这是因为：

第一，从创作过程来看，《三国》和《水浒》都属于“世代累积型”的作品，它们出自于众人之手。参与创作的各式人等，虽然由于职业、身分、以及文化素养等等的不同，审美心理上存在着差异，但是，作为同一民族的人，每一个人的审美心理的深层，无不积淀着民族审美的集体意识。这种民族审美心理集体意识，通过各种途径投射到作品中，经过历代人的求同存异，这两部小说已经不是某一个作家或某一阶级的审美心理产物了，而成为民族审美心理的凝聚物。当然，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优秀作品，也往往表现了民族的审美心理。不过，我以为，在这方面，“世代累积型”的优秀作品往往表现得更明显。值得一提的是，“市民说”之所以独树一帜，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注意研究了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可惜的是，他们的目光仅仅落

在市民的身上，而未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他们仅仅注意到市民的审美心理，而未进一步探索其深层的民族审美心理。

第二，从小说发展史来看，《三国》、《水浒》代表着小说艺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阶段，即所谓英雄传奇阶段。这一类小说塑造的人物，往往都是“神化”或者“半神化”的人间英雄。“他们身上，明显地赋予了作者强烈的理想和夸张，以至他们成了人类某种品质的化身而多少带上了神或半神的性质”。^①因此，《三国》、《水浒》这类小说不同于后来的严格的现实主义小说，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更近于西方的英雄史诗。“作为一种原始整体，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②黑格尔的这段话，对于《三国》和《水浒》来说，多少也适用。这两部小说塑造的颇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式英雄，已非普通人，而是民族精神的显现物。硬要把书中英雄评定阶级成分，难免作茧自缚。

第三，从作品实际来看，《三国演义》描写的是图王霸业的明主、贤臣、良将；《水浒传》塑造的是除暴安良的义士、豪侠，其中上至龙子凤孙，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各式人等皆有。这些英雄，尽管“各有光景，各有家数，各有身分”，个性各异，但英雄性格的内在精神却是那么的一致：他们勇敢、正直，忠勇报国，富于进取，扶弱济危，舍身取义……。这些，正体现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对此，张啸虎同志在他的《水浒英雄与民族性格》^③的长文中，作了富有启迪的详尽论述，他指出：“《水浒传》的重要成就，就首先在于充分调动艺术手段，通过一系列血肉饱满的文学典型，集中表现英雄主义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他的精辟论述同样适用《三国》。不过，张文的前提是肯定《水浒》写的是起义的农民英雄，他认为作品中的英雄人物，“可说是真正表现了农民起义者的思想中的伟大处，情感中的深刻处，行动中的坚强和融贯一致处，因而也在某些方面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而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三国》、《水浒》中的英雄豪杰，首先是体现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的史诗式英雄，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一样，他们体现了民族之魂，因此，现实生活中各阶级的人都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心中理想英雄的身影，得到各自需要的东西。这也许就是人们对梁山英雄的阶级属性产生分歧的一个原因吧！

当然，民族审美心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清代的两大“奇书”，《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中的正面人物杜少卿和贾宝玉，及时地传达出他们那个时代审美心理的某些新变化，因此，这两部小说远远超出《说唐》、《说岳》等重现《三国》、《水浒》人物形象旧貌的作品，而成为同时代作品中的第一流杰作。

二、英雄颂曲和豪杰悲歌

《三国》、《水浒》同是讴歌史诗式传奇英雄，但这两支英雄曲的主旋律却迥然不同。

《三国演义》是一支乱世英雄的颂曲。作品所展现的时代，正如刘备所说，是一个“朝庭陵替，纲纪崩摧，群雄乱国，恶党欺君”（第三十七回），天下分崩的乱世。世乱而英雄出，以刘备集团为代表的三国英雄们，于乱世中纷纷崛起。明君得贤臣，良将择英主。君臣风云际会，霸业图王。其时，大智大勇的才能任其施展；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的大志如其所愿，“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理想得以实现。英雄起于乱世，乱世造就了英雄。一部《三国》，谱写的就是这样一支颂扬“英雄乘时务割据”^④的英雄曲。至于小说最后，蜀汉灭国，三国归晋，也非是邪恶战胜正义的历史悲剧、民族悲剧。其实，蜀汉灭国的原因，是前辈英雄孔明等相继去世，“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后继无人，三国归晋，是东晋司马炎、羊祜、杜预和王浚等又一代英雄乘时一统天下的结果。作为全曲的尾声，它是对前代英雄的缅怀，又是对后代英雄的颂扬，与全曲高昂热情的主旋律完全一致。

《水浒传》则是一首绿林豪杰的悲歌，它唱出了梁山英雄的悲剧命运。梁山英雄命运的悲剧，并不表现在或不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后半部——招安遇害，而主要表现在小说的前半部——逼上梁山。这是因为，在《水浒》的作者看来，招安，是英雄豪杰报国建功的唯一出路。花荣临死前说得很清楚：“我等在梁山泊时，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讨南征，建立功勋。今已姓扬名显，天下皆闻。……如今随仁兄同死于黄泉，也留得个清名于世，尸必归坟矣！”至于梁山英雄遇

① 孙逊、陈诏：《红楼梦与金瓶梅》第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②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08页。

③ 见《明清小说研究》第4辑，第9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2月版。

④ 明·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害，应该看到大都死于征方腊的战斗中，而“血染沙场，马革裹尸”，正是古代英雄豪杰向往的归宿之一，正如阮氏兄弟所说：“我哥哥今日为国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没了名目。”尽管宋江、卢俊义等被鸩而死，但“身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的理想毕竟已实现。梁山英雄豪杰的真正悲剧，在于英雄失时，逼上梁山，“自身最不情愿走的路而最终不能不走，这乃是人生的真正悲剧”，①这里，我们不妨将两组人物作一简单的比较：

一是诸葛亮和宋江。

诸葛亮自比管、乐，寄经天纬地之才。他躬耕垄亩，隐居隆中，以待天时。刘备三顾茅庐，他应命出山。从此，不畏艰辛，南征北战，开创了鼎立三分的大业，成为万世贤相的楷模。宋江“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身为郓城小吏，久有凌云壮志，然而年岁徒长，功名未遂，几经死难，尽管他认为上山落草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终于身不由己，不得不逼上梁山，同为英雄，一出山开创大业，一上山落草为寇，命运何其不同！

二是关羽和武松

关羽“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武松“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知恩必报，见义勇为。二人同样英勇双绝，又都因人命干系避难江湖。然而，关云长生逢乱世，又遇明主，遂乘时而起，威镇华夏，为开创蜀汉基业，建下丰功伟绩。虽有麦城之败，但生时封侯，死后为神，功成名就，壮志已酬。武二郎行侠仗义，除暴安民，却不能容于社会，至使英雄无路，落草为寇。后虽得招安，亦建成功，却落

得断臂身残，独守青灯古塔，了却残生。二人同为英雄，命运竟如此相异？

显然，和三国英雄相比，梁山好汉真是时乖运蹇，生不逢时。梁山好汉所处的时代，是李贽所说的“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的时代。梁山英雄们，忠如宋江、杨志，他们有志报国，却报国无门；勇如鲁达、武松，他们见义勇为，却反遭迫害。扶弱济贫的义士，除暴安良的豪侠，本是古代老百姓苦难中的救星，他们能拯救别人，却不能拯救自己，竟落得有家难奔，有国难投，不得不铤而走险，逼上梁山。英雄的志向不能伸展，英雄的行为不为世容，落草为寇的现实粉碎了建功立业理想。英雄与时代发生了冲突，时代压抑了英雄。一部《水浒》谱写的就是这样一首英雄失时的悲歌。难怪清人王望如要在他的《五才子书水浒序》中叹息道：“之百八人者，非宋朝之乱臣贼子耶？苟生尧舜之世，井田学校，各有其方，皆可为耳目股肱，奔走御侮之具，不幸生徽宗时，或迫饥寒，或逼功令，遂相率而为盗耳。作者之旨，不责下而责上，其词盖深绝而痛恶之，其心则悲悯而矜疑之，亦有关世道之书，与宣淫导欲诸稗史回异也。”②

综上所述，《三国》和《水浒》，一为乱世英雄的颂曲，一为绿林豪杰的悲歌，它们讴歌了中华民族史诗式的传奇英雄，唱出了不同时代英雄豪杰的不同命运。其故事的深层结构里，潜藏着古人对英雄和时势关系的深思。

① 左东岭：《论〈水浒传〉的悲剧特征》，《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87年第2期。

② 见《水浒传会评本》上册第3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一借再借的常时节——读《瓶》记失之四

西门庆的诸帮闲兄弟中，常时节是个常时借的朋友，与西门庆过从交往，多有伸手求借的事。不过，《金瓶梅词话》第60回中，讲及常时节为置办一处房子以度日子而向西门庆求借，居然前后借了二次，这也未免太多了点。

这60回中，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众人均来庆贺。在座者有常时节。“原来西门庆近日为了他五十两银子，使三十五两典了房子，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个小小杂货铺儿过其日月，不题。”谁料，在同一回中，作者又画蛇添足道：

却说次日……西门庆因问伯爵道：“常二哥说他房子寻下了，前后四间，只要三十五两银子，就卖了。他对我说，正值小孩病重了，我心里正乱着哩，打发他去了”“也罢，你吃了饭，拿一封五十两银子，今日是个好日子，替他吧房子成了来罢。剩下的教常二哥门面开个小本铺儿，月间撰的几钱银子儿，勾他两口儿盘揽过来。”伯爵应命而去。

这样看来，常时节竟短时间里遭西门庆周济两次，且都花了三十五两银子买了房产等，恐怕借得也太多了吧？

（悠悠）